

王永幸与下丁家

□张久深



全国劳动模范王永幸

孙松如/摄影

在胶东半岛层峦叠嶂的山区，有一个全国著名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的农业先进单位——龙口市下丁家镇下丁家村。这面旗帜的擎旗人就是全国劳动模范、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幸（1925—2000）。

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王永幸带领下丁家人团结拼搏，锐意进取，战天斗地，艰苦创业，把一个“山是和尚头，光溜溜，地是一层皮，乱石窝”，“十年总有九年旱，庄稼见种不见收”的穷山村建设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

王永幸 1925 年 8 月 4 日出生在下丁家圈子村。1937 年至 1940 年在本村小学读书。1938 年加入儿童团。1941 年至 1944 年先后在龙口磨坊、盐店打工。1945 年 6 月参军，先后在黄县公安局、北海公安局受训近一年。1946 年春参加北海武工队，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编入胶东武工队。1946 年春至 1948 年冬，随从武工队在即墨、昌潍等地活动，先后参加战斗百余次，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曾荣立集体三等功一

成千上万的华工和法国军民，向发生过激烈战斗的原阵地开去。放眼望去，满地都是破枪、碎片、头盔衣物，令人感觉恐怖。坑洼毗连，沟壕纵横，可见当时战斗的惨烈。

清理工作进行得很有秩序。由

法国官员指挥划片分工清理，先收拾枪支，捡到长枪、短枪分好坏两类捆好，装车运走。再把炮弹按型号分类搜集起来，大的几人抬，小的装木箱，也装入卡车运走。然后捡弹壳、铁片，都拾成堆，装入筐篓，装车运走。最后将那些头盔衣

帽鞋袜，也拾成堆运走。清理干净的地带，即用大型推土机将战壕填平，将地堡推倒，将坑坑洼洼的地面一律推平。不久，满目疮痍的大地，变成了平畴无垠的旷野，成为栽种谷物的农田。

之后，华工分批乘船回国。□

次。1948年武工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纵队，王永幸随军开赴淮海战役前线。在攻打兗州时，身负重伤，荣立二等功。1949年4月以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身份复员回原籍，任黄县芦风区公所民政助理。1950年4月，他带着伤残，怀着建设家乡的理想，志愿辞去公职回乡务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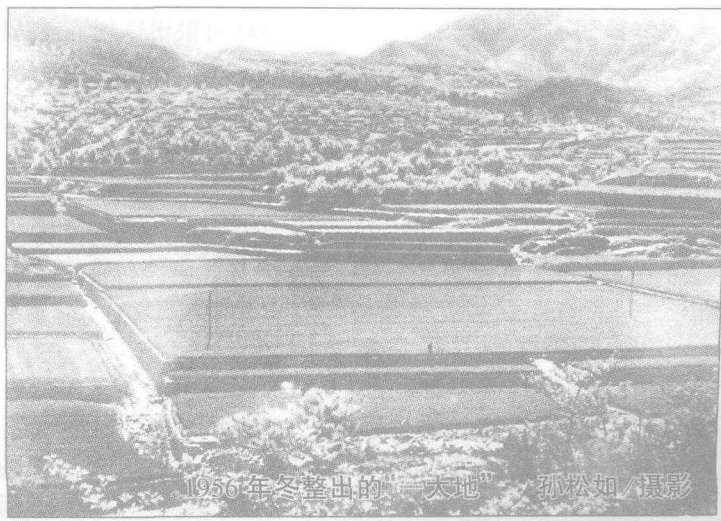
1952年春，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精神鼓舞下，王永幸带领圈子村9户农民成立了下丁家乡第一个互助组。9户人家一条心，春耕没有牲畜，缺少农具，他们白天黑夜轮着干，硬是用锄头一锄一锄地把地刨遍；春播种子不够，他们就发扬互助合作精神，你拿一碗高粱，我凑一瓢玉米，把庄稼种上。春旱打井遇上大石头，大伙一起凑钱；王永幸把自己的复员费拿出一大半，买来了炸药，炸掉石头，打出水井，战胜了旱灾。为增加收入，互助组还办起了小粉坊加工粉丝。这一年，互助组获得了亩产214公斤的好收成，比单干时增加了将近50公斤，积攒了200多元现金。秋后，这个互助组扩大到28户。

1954年春天，王永幸带领21户农民办起了“红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王永幸当选为社长。“红光社”建立后，王永幸立即着手建立一套规章制度。在劳动管理上，试行包工定额制，社员不分男女老幼，同工同酬；在经营管理上，实行土地入股分红政策，按工计酬。社员劳动有了积极性，生产进度又快又好。1955年是个大旱之年，“红光社”小麦喜获丰收，亩产达280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而社外农户因干旱几乎全部减产。最使社外群众折服的是，社里有一块梨树行，单干时大梨年产仅在2000公斤左右；“红光社”接手后，实行科学管理，及时施肥浇水、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当年产梨4000多公斤。这年冬季扩社时，“红光社”一下子发展到46户。就连当初一心想和“红光社”比个高低的单干户王老头，也拉着牲口扛着犁入了社。在“红光社”的带动下，下丁家乡其它6个自然村也办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此，下丁家乡共创办了7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户数为230户，占全乡总户数的50%。

1955年，全国出现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是年12月，下丁家乡7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建立了“阳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王永幸任党支部书记兼社长。入社户数453户，2201人，土地2500亩，分别占总户数的97.8%、总人口的99.1%、总耕地的98%。社以下按自然村设7个生产队，42个生产作业组。其中农业组34个、果树组8个。“阳光社”建立第一年，出现了生产队之间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一时间，社队干部之间产生了抵触情绪，

社员思想也浮躁不稳。王永幸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党支部成员反复研究，采取了多割少补、适当平衡的办法，进行了妥善解决。并制定了“四固定”、“定额管理”、“土地包工”等措施和奖惩制度。重新修订了年度计划，完善了各项财务管理制度。从此，社员干部有章可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再次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高级社。

高级社建立后，为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王永幸带领全体社员揭开了治山治水向大自然宣战的序幕。社员们奋战一冬春，投工2.5万个，在青石板上打出了17眼大井，扩大水浇地100多亩。1957年春旱，许多井底朝了天，王永幸与大家一起，分析当地水源的特点，决定以蓄水为主修建水库。为了确保水库在麦收前竣工，全社青壮劳力齐上阵，苦战40个昼夜，在大吕家村后修建了第一座水库。当年秋天，又投工12万个在口子村修建了第二座水库。冬天，投工25万个，完成了12项水利工程，水浇地面积扩大到900亩。王永幸在带领大家治水的同时，还大搞治山整地。过去，这里的土地土层薄，石头多，阴阳膀，大斜坡，支离破碎，七零八落。1956年，他带领一个青年生产组将圈子村南崖七块零星地整成一块六亩零七分平坦地，群众称为“一大地”。为后来的整地改土树立了样板。在长期的实践中，王永幸同大家摸索出一套较成熟的山区整地经验，概括起来是“两平、石堰、能排能灌”八字要求和“因地制宜，当年见效，先易后难，最后攻坚”十六字原则，具体方法有“大过箩”、“大开膛”、“大起大落”、“小并大”等。据统计，高级社期间，全社共付出3.5万个工日，垒建梯田石堰1.6万平方米；搬动土石方8万多个；整治稳产高产田和高标准梯田500多亩。生产条件改善后，粮食连年增产。1956年，全社粮食亩产达到332公斤。1957年，在大旱的情况下，粮食亩产仍达280公斤，总产63.7万



1956年冬整出的“一大地” 孙松如/摄影

公斤。人均分配口粮 221 公斤。从此,下丁家结束了吃返销粮的历史,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爱国粮 11.5 万公斤。与此同时,全社还大搞植树造林,成林面积扩大到 1800 余亩,半成林面积扩大到 2600 余亩,果园 400 余亩。1957 年,果品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 41%。经济收入由 1956 年的 13.8 万元,增加到 22.8 万元;人均分配由 71.3 元增加到 83.5 元;公共积累由 8422 元增加到 2.3 万元。年底王永幸出席了山东省第三届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他在会上代表十个山区农业社发出“以愚公移山精神改变山区自然面貌”的倡议,对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8 年 8 月,在人民公社化“浪潮”中,“阳光社”与周围 10 个高级社合并升级为“大山人民公社”。“阳光社”改称下丁家生产大队。“大山人民公社”成立后,正是“五风”盛行之时。以王永幸为首的下丁家大队干部,为了应付上边的检查,他们也种了几亩“卫星田”;为了让社员能吃饱,他们不昧良心说假话,如实上报产量,坚持不卖过头粮;1958 年他们迫于形势办了公共食堂,但很快便拆了“大灶”改“小灶”,杜绝粮食浪费;为了补足社员口粮,鼓励社员种好自留地,发动群众在地边沟坡开荒种杂粮。就这样,三年困难时期,外村不少人三年饿着肚皮,下丁家人却都能吃饱肚子坚持三年大干,每年都向国家交售余粮 25 万公斤。1960 年,党中央开始纠正“五风”。王永幸带领支部一班人积极响应,首先恢复和建立各种劳动管理制度。实行“四包一奖(包工、包产、包产值、包成本、超产奖励)承包制和“四小管理”(小段计划、小段定额、小组作业、小段检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生产队、作业组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肃清了“五风”的影响,促进了山区水利建设和农林副各业的发展。从 1959 年到 1961 年,修建蓄水 13 万方的水库 1 座,塘坝 7 座,打水井 153 眼;添置柴油机 4 台,汽油机 1 台,抽水泵 5 台,水浇地面积扩大到 1072 亩。其中 400 亩粮田达到灌溉机械化或自流化。整地 1000 多亩,薄地压土 600 亩,沙地压土 700 多亩。1961 年单产达到 431.5 公斤,比 1956 年增产 100 多公斤,年人均口粮 200 公斤以上。1961 年,下丁家大队的农业总收入达 35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了 70%;公共积累达 15.1 万元,是 1957 年的 5 倍。当年社员开支总额 11 万多元,人均 103 元。全大队 80% 以上的社员成了存款户。

1965 年春,在全国学大寨运动高潮中,王永幸受群众的委托到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他从下丁家大队的实际出发,重新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山区大业的宏伟规划。从 1963 年到 1965 年底,下丁家大队抓了三件骨干工程:

高山水库。下丁家大队先后建成四座高山水库,初步建成了以蓄水自流为主的高山水利网。其中圈子村的高山水库于 1964 年冬动工。先后投工 2.5 万个,投资 3.5 万元,坚持大干六个冬春终于建成,使 80 亩高山梯田变成了水浇地。

“三层楼”水库。1957 年修建于口子村西的岔河沟里。因地势而分上、中、下三层修建,至 1966 年建成,使 330 亩梯田全部实现了水利化。

“啃硬骨头”整地工程。所谓“啃硬骨头”整地,就是所整地扒开地皮下面全是凹凸不平的石头,须镐劈炮轰,既费工又费力。从 1963 年冬到 1964 年春,王永幸带领第三生产队全体社员,连续整治了圈子村西冈和台儿冈 20 亩地。

1965 年,下丁家大队荣获“全国农业战线红旗单位”称号。



1980 年夏天王永幸(右二)随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团出国考察 孙松如/摄影

1965 年 10 月,《大众日报》发表通讯《下丁家大队是改造自然的光辉榜样》和社论《自力更生,无往不胜》。

1966 年 10 月,王永幸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二)

“文革”中,王永幸紧紧地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一面带领广大党员群众抵制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一面坚持组织农业生产,治山治水,整地改土,实现了山区水利化、耕种田园化和荒山绿化,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在“文革”中,下丁家大队也有几个人参与了社会上打砸抢活动。面对当时的形势,下丁家大队 90% 以上的干部和社员思想没乱心没散。王永幸带领大家一边“抓革命”,一边真心实意地“促生产”。在河滩上造

出了16亩和22亩两块“小平原”，又在乱石成堆的龙王湾造出了27亩“大平原”。1969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人物特写《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柱子》。省、地、县各级领导部门相继发出《向王永幸同志学习的通知》。1969年，王永幸当选为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下丁家山高坡陡，自古无路。山上山下，多少年来全靠一根扁担两个肩。每个成年社员一年少说也要担几万斤。修筑环山公路是广大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1976年，王永幸与总支一班人研究决定，利用农闲季节修筑环山公路，把压在扁担底下的劳动力解放出来。秋收刚结束，下丁家大队便隆重地召开了修路誓师大会。会一散，400多人组成的筑路大军就浩浩荡荡地上了山，他们迎风冒雪，在海拔300多米的山顶上搭起窝棚，垒起炉灶，劈悬崖，凿峭壁，山上山下一派大干快上的热火朝天的景象。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大队又成立了一支突击队，王永幸亲自带领上阵。按国家规定标准计算，全工程需26万个工日，要大干三个冬春。结果只用了8万个工日，到1977年秋收前，长达32华里的环山公路全部竣工。他们先后共搬运土石16.7万多方，架起桥涵69座，用石3000多万方……环山公路建成了，交通便利，劳力解放，劳动强度减轻，生产条件也随之大变。这时，“四人帮”也已经垮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下丁家大队干部群众更进一步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在1976年粮食单产达964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的基础上，又战胜了1977年、1978年连续两年干旱，粮食产量稳定在950公斤左右。1978年，王永幸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9年，下丁家大队受到国务院通令嘉奖。1983年，王永幸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永幸带领下丁家村干部群众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调整了产业结构，努力发展多种经营。1980年夏，他随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瑞士等国，看到各国的农村建设，受到了很大启发。回来后，他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描绘出“山顶林、山腰果、山根梯田种粮食”的宏伟蓝图，并提出发展林果生产的具体规划：发展山楂、杏、桃各1万棵，葡萄园100亩。如今，宏伟蓝图已变为现实。

为彻底解决山区缺水的问题，他提出在建设高标准水利化上下功夫。1983年春，他带领150多名劳力，开赴山顶，在100多米高的陡峭山路上，硬是靠两个肩膀把6万多吨的石块、物料扛到山上，以人们难以想象的毅力，拼搏了三春两冬，投资140万元，在凤凰山上修筑了一座蓄水30万立方的“高山水库”，同期

续建水库、塘坝4座，扬水站7座，打大口井6眼，开挖浆砌渠道2000多米，修倒虹吸1000多米，总蓄水能力达到130万方，实现了山顶修水库、山腰建塘坝、山根库井结合的“三级蓄存水源”治水规划。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前提下，他还领导干部群众，开发利用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办工副业，繁荣了集体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到1985年全村工副业项目已发展到20多个，年收入达到356.7万元，全村公共积累580万元，人均分配949元。1986年，王永幸退居二线，改任下丁家党总支副书记。交班时，他对村干部提出的要求是：“不为名，不为利，群众放心党满意。”

1989年8月，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到下丁家视察工作。王永幸向各级领导汇报说：改革十年，下丁家人的日子更富裕了，但艰苦创业没停步。十年中，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总投资达370万元，连续十年亩产超吨粮，果、林、工、牧、副等各业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1989年10月，《大众日报》发表通讯《老模范的新业绩》。

1990年5月，中顾委委员谭启龙来下丁家视察。题词：事在人为，人定胜天。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来下丁家视察。

1993年元月，宋平题词：艰苦创业，为民造福。

(三)

王永幸在生养自己的下丁家奋斗了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带领群众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建设繁荣富庶的新农村为己任，兢兢业业，奋斗不息。

早在1948年7月兖州战役中，王永幸身负重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又积劳成疾，患了肝病。

1971年11月，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下丁家参观，得知王永幸病重后十分关心。

1972年由杨得志司令员安排，经千佛山医院治疗基本痊愈。

1994年发现腿部浮肿，初未介意。直到肿成硬块，行动困难，才在亲友的婉劝下去了医院。

1995年病情加重，胸腔积水，排尿困难，直至病危。有关部门将其病情报告省委，省委领导批示：组成治疗小组，组织专家会诊、抢救。经进一步检查分析，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同年9月，病情再度恶化，专家与治疗小组联合会诊后决定：提高生活质量，保守治疗，延续生命。王永幸以顽强的意志，坚持与癌症作斗争。人们从没听到他呻吟一声。在上级关心重视、专家精心治疗下，他的病情竟出现了奇迹，很快好转、稳定。4个月后，回家疗养。

1997年4月去省立医院进行放疗，住院2个月，

6月中旬回家。嗣后每月复查一次。病情保持稳定。

1998年3月,出现呕吐、恶心现象,两腿浮肿,胸腔积水,再次住进省立医院。后经北京医科大学专家处理,借助“肾造瘘”排尿,病情缓解。

1999年10月底,王永幸病情再度恶化,住进省立医院。经检查诊断:肾衰竭,心衰竭。停止放疗,只能保守治疗。12月底,王永幸执意出院回家。

2000年元旦在家中住了一个晚上,又回市立医院。元月13日,中午仍坚持吃饭,并要求坐起来抽支烟。医护人员及亲属婉劝无效,只好将他扶起来为他点上烟。吸了半支后,还很不过意地说:“好啦!你们都回去忙吧!”几小时后,这位党的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溘然长逝,终年75岁。

住院期间,家属与医护人员达成默契:不敢向他如实讲住院费;有时甚至要说假话、往少里说。不然,他会因为花钱多闹着出院。不太了解他的人有时劝他说:“反正是共产党的钱……”他会更不高兴了:“共产党的钱也是老百姓的钱……我就这个样子了,还闲呆在这里干啥?出院,回去!”在省立医院养病期间,老伴战桂英也想让医生给自己检查一下身体,治治病。王永幸同意了。但再三强调:“在这里看病、治病可以,医药费要自付。我治病已花的不少了,老伴看病、治病一定要自己掏钱!”直到检验过老伴开出的付款单才算放心。他的言行使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大家感慨地说:“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怎么会不从心里敬佩啊!”

回顾王永幸的一生,真正是只讲奉献,不讲索取,耿直廉洁,两袖清风。

他为政清廉,清廉得几乎不近人情。有一次,他不到6岁的小儿子跟随大儿子到山上锄花生,拣回几个风刮、虫蛀的落地梨,带回家放在纸盒子里。他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大儿子,并吩咐说:“你捧着梨去找你永伴叔,让他带着你绕街转两圈……”他从不接受别人礼物,不吃别人的东西。“红富士”苹果刚刚在当地试种,秋后苹果下树,果林队送给他一筐让他尝尝新,他执意不收,最后付了钱。全国人大代表有一项待遇,每年可带家属去北戴河、庐山疗养一次;香港回归,也有请柬发来……他都谢绝了。1986年夏天,有关部门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后,由二儿子清忠硬拽着他去了北戴河,休息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除了吃饭,他什么钱也不花,不租车,不买瓜果,连特价供给的茅台酒也不舍得喝。儿子怕他馋酒,劝他喝点,勉强同意只喝一块钱一瓶的北戴河白酒。儿子说:“你带这种酒进餐厅,不怕别人笑话?”“咱倒进茶杯里端进去,谁认得出是什么酒?”……

王永幸做人的信条是:弱不欺,强不惧,光明磊

落,无私无畏。弥留之际,他告诫子女们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们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我这棵树连磨盘也遮不住,要靠自己!”

他惜财,但不贪财。村里的来往账目和报销单据他从不签字。但笔笔收支都了如指掌,心里异乎寻常的清楚。在省立医院住院期间,无论是村办企业,还是亲戚朋友送的钱他都全部退还。平时老战友来了,请进家里,碰上啥吃啥,用家常饭招待。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家9口人仍挤住在3间半房子里。孩子大了,只好去借住队里的马棚。1972年他去济南治病,家里乘机盖了栋北屋。他若在家,绝不让盖。为了不用村里的木料,孩子们让舅父从海阳县买来松木棒作椽子,从黄河营买回刺槐当檩条,借钱抢时间盖了起来。在儿子结婚盖房子时,王永幸选了一块村里最差的房基地,地势低洼,孩子们起早贪黑,干了一春季才填平。亲友帮助批来的几方按调拨价处理的废枕木,又让王永幸转让了别人:“他们家比咱困难!”大儿子清业复员回来,母亲歉意地说:“拖一年再结婚好吗?为盖房,家里还有欠债……”盖房借的债,直到1978年才还清。

1987年,他不得不外出为村办企业去跑一批热门的工业生产原料。按当时政策规定可提成6万元。党总支认为,他已退居二线,得这笔奖励性报酬合情合理。而公司总经理王清业却说:“我看算了吧!要给你们去给,我可不去。况且我也不同意。我要把钱送进屋,不挨耳光子也要挨顿臭骂——我如果同意去送,那我也不像他儿子了!”别人谁又敢去呢?最后这笔钱归了集体。事后,党总支部书记战德路向他作了汇报。王永幸满意地点了点头:“你们做得对。”

在其一生中,有三次机会转为国家干部,他都谢绝了。退居二线前,有关部门又考虑给他定级转为国家干部,迁入城镇,安度晚年,又被他拒绝:“我不愿离开在一起劳动了一辈子的乡亲们!”这是他的心里话——终老山村,与下丁家人苦乐与共。

凤凰山不老,泳汶河长流。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人们将会更加怀念那位铁骨铮铮、一身正气带领人们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柱子”王永幸!人们将世代传唱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

胶东半岛,凤凰山,
下丁家就在山下边,
艰苦奋斗创大业,
穷山沟变成米粮川……

胶东半岛,凤凰山,
下丁家就在山下边,
千秋业绩载史册,
“铁柱子”精神代代传!